

# 一種觀點的建立

## A Way of Seeing

陳正熙 Cheng-Hsi CHEN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專任講師

劇場觀點是「異議的」觀點，是「少數的觀點」。

在一本非常有趣的劇場入門書《*Theatre, A Way of Seeing*》中，作者Milly S. Barranger開明義就說，劇場是一種觀看自我、觀看他人、觀看社會的方式。在劇場中的創作或觀看的經驗，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層次上，與我們所生存的現實情境相聯繫，俗語中所謂的「人生如戲」或「戲如人生」，也只有從這樣的論點去思考，才有其真切的意義。

既是觀看，就需要有一種特定的觀點，也就是一種「劇場的」觀點。

從歷史來看，劇場的觀點一直是一種「異議的」觀點，是會令掌握權勢者不安的觀點。西元一二二一年，義大利西西里島的菲德烈二世發布了一個與戲劇表演有密切關係的敕令：任何西西里公民，在任何情況下可以對任何一個表演者施暴，甚至加以殺害，而無須擔負任何罪名，因為這些表演者專事毀謗作亂。西元一六九八年，一位英國教士發表了一篇短文，對當時英國劇場在道德上的墮落大加撻罰，並且對劇場創作者的社會道德責任嚴加要求；這樣的呼聲，加上有關劇場經營特許權的衝突，導致在西元一七三七年，全世界最老牌的民主代議組織英國國會，發布了第一個劇場檢查的法令，規定任何戲劇製作都必須先經過宮中大臣的檢查通過，方得公開演出，直到西元一九六八年，這樣的法令才正式取消。西元十九世紀末，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幾部對婚姻與家庭的壓迫嚴加批判的作品，在歐洲大陸演出時，

不僅引起許多爭議，連戲的結局都曾被保守的導演竄改，甚至在許多地方都遭到禁演的命運，而同樣的這些作品在今日卻早已經成為文學戲劇史上的經典之作。

在前述的這些例子裡，劇場演出對社會大眾的影響，當然並非身處在傳播網路時代的我們所能想像，那些對劇場工作者的指控或歧視，對我們而言也似乎遙不可及；但如果我們對現在的社會文化情境加以檢視，我們會發現，正因為各種傳播媒介的日益精進與普遍，現代的劇場工作者不僅失去了大部分對社會的影響力，並且受到前所未見的漠視與消失的壓力。這樣的困境，不僅只出現在許多與社會現實差距日遠的傳統戲曲形式，即便是對於現代劇場的工作者，觀眾人數成長的停滯不進，製作條件的日趨緊縮(包括政府對私人機構的各項贖/補助)，和劇場演出在大眾文化環境中的邊緣化，也都是無法忽略的現實問題。

面對來自其他藝術或傳播媒介的競爭壓力，除了轉業的選擇之外，不同的劇場工作者採取了不同的「生存策略」。屏風表演班的《徵婚啓事豪華版》找來了影視明星助陣，果陀劇場直接選擇經票房成績驗證的戲劇或電影作品直接改編，如在百老匯與好萊塢的製作都相當成功的《再見女郎》，和卓別林的默劇經典《城市之光》，綠光劇團的《愛情沸點八度半》請著名作家吳念真先生擔任編劇。而無論在題材內容或表現形式上有何差別，這些作品有幾個共同的特點：通俗溫和的愛情故事，毫無爭議的角色人物，輕鬆笑鬧的情調，並且與影視媒體所呈現的大眾品味完全一致。相對而

言，我們在許多小劇場團體的演出中，看到的卻是較具有創作者個人特色，對社會與個人生命的思考，與一般大眾品味有些差距的作品。就以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所主辦的【寶島地震帶實驗劇展】系列節目來看：在〈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的《Zodiac》中，透過那些對觀眾的感官加以挑戰的多媒體呈現，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價值的多元與混亂，在外表坊時驗團的《一又三分之一》裡，從細膩的語言與情感表現中，我們看到的是所謂友誼與親情的幽微動人、社會職場的荒謬情境、和男女情愛的曖昧牽扯，我們還可以看到後山(台東)民衆的離鄉經驗(台東劇團《移動的太平洋板塊》)，胡撇仔戲與俗民文化的拼貼趣味(金枝演社《可愛冤仇人》)，銀髮族的羅曼蒂克(歡喜扮戲團《鹽巴與味素》)，溫馨甚至接近濫情的情書關係(親愛的劇團《收信快樂》)，暴露污穢、卑劣、殘忍的驚世駭俗(密獵者《歐風晚餐》)，對威權時代的成長經驗的回顧(臺灣渥克劇團的《我的光頭校園》)。

與大眾品味的差距，並不能作為驗證作品好壞的依據，大眾品味的本身，也有其嚴肅思考討論的價值，但如果我們期待劇場的演出，能夠提供一種有異於大眾傳播媒介的觀照或思索，能夠表現出劇場之不同於其他媒介的特殊性，也就是劇場存在的必要性，那麼劇場創作者之堅持異議、堅持少數，應該是有其必要的。

就現實層面來看，在一個由相互仇恨的政客、嗜血的媒體、冷漠而分裂的社群、和錯亂的人際網絡所構成的社會情境中，任何與「大眾」或「主流」有所牽連的事物，都不免沾惹「從俗」的塵埃，或不由自主地陷進「媚俗」的坑壑，劇場之堅持採取異議/少數的立場，並非「作為清流」的道德堅持，而是一種介入社會現實的積極作為，劇場的堅持發聲，也才能有別於其他媒介。從劇場的發展歷史或社會的

改變來看，所謂的異議或少數，終究也都有成為主流的可能，但也就是因為不斷有人不滿於現狀、不願接受約定俗成，不同觀點的不斷辯證和社會的變革也才有可能。

義大利著名劇場工作者，於一九九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達里歐弗(Dario Fo)，在他得獎的演說中提到，身為一個劇場工作者的責任，就是為觀眾具體呈現周圍現實世界的真實狀況，最終並能讓觀眾具備「說出自己的故事」的能力。「自己的故事」當然不只是八點檔連續劇或好萊塢電影中，那些永遠都大同小異的故事，而是與每一個別的生命切身相關的，堅持異議、堅持少數的敘事觀點。

從這裡開始，我們試著建立一種劇場的觀點。■

### 《註釋》

- 1 這段資料來自義大利著名劇場工作者達里歐弗，於一九九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的致詞。